

深耕童軍在台灣

——謝又華

(訪問及資料整理：陳明終、邱鈺惠、蕭佑梅)

壹、生平簡介

謝又華先生，出生於民國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江西省崇仁縣人。

學歷

廈門大學畢業。

經歷

民國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期間曾任青年軍 209 師政治部少校訓導員、國防部預備幹部局青年職訓班中校教官、國防部預備幹部局嘉興青年中學教官兼訓導組長、陸軍幹訓團第一總隊上校組長等軍職。

民國三十八年來台後曾任台灣省立台中二中教員及台灣省立台北成功中學教員。

民國四十一年至四十七年擔任救國團總團部副組長、組長等職務。

民國四十九年至五十五年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總幹事。

民國五十五年至六十五年任教育部總務司長及社教司長。

民國六十五年至六十七年擔任中華電視公司總經理。

民國六十七年至六十八年任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廳長。

民國六十八年至七十一年擔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副主任委員。

民國七十一年至七十九年擔任救國團副主任。

自民國三十四年起至七十九年退休，計服公職達四十五年。其間除參加青年軍及奉調任中華電視公司總經理各兩年外均係從事青年教育工作。民國四十五年，復應中國童子軍總會理事長張其昀先生之邀參加總會工作，先後擔任總幹事駐會常

務理事及國際委員逾廿年，以義務服務員身份負責會務推展。任內確立「青少年志願參加」及「成年人義務服務」兩項工作原則，並將童子軍運動定性為教育性的社會事業。同時積極參加國際童子軍活動，使中國童子軍成為國際組織中極具建設性的一份子。先後獲得美國、日本、菲律賓、韓國、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及世界童軍總部頒贈榮譽獎章。對提高中國童子軍國際聲譽，不無貢獻。

座右銘

只問耕耘，不問收穫

事實上，隨著人生的發展，每個階段會有每個階段不同的準則。我個人在年輕的時候，因為我是基督徒，念的是教會學校，對於做事的標準，我始終記得這八個字「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對於一個年輕人不管從事哪一個工作，努力工作最重要。至於能有多少收穫？這是不一定的。有的花的力氣少，而可以有很大的收穫；有的你花了很多的力氣，結果變成白費力氣都有。如果計較收穫的話，則耕耘努力都會不夠。所以我一直記得這八個字「只問耕耘，不問收穫」，這是一個青年離開學校以後，或在學校之中，都可以用來做為一個座右銘。只問努力了沒有？不要斤斤計較究竟有多大的收穫。現在功利主義往往過份計較，從事教育工作很難這樣計較，而且幾乎不可能這樣計較，說在學生身上花了很多心血，這個學生一定成材嗎？不一定。有時候一兩句話影響一個學生的終身，有時候苦口婆心而學生頑石不點頭，這樣的情形都是有的。我在年輕直接從事教學工作的時候，都一直謹記這句話。

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

隨著自己到社會上工作，年紀漸長，所做的事情慢慢地影響越來越多人的時候，開始體會到「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這句話。你做任何影響很多人的決定，不可能個個都做好，不可能個個都很滿意，但是你自己要捫心自問，這個決定是為了什麼、目的是什麼，這裡面有沒有偏？有沒有私？有沒有為自己打算？還是說是為了工作？尤其擔負的責任愈大，恐怕愈要體認這句話，不然你將惶恐終日，這樣做不對，那樣做也不對。

貳、家庭的影響

.....

談起謝先生平日待人處事所秉持的原則，是否受到父母家庭的影響，謝先生以

長者的口吻說道：

「以我們這一代的人來說，能供給你們甚至更年輕一輩做參考的經驗其實不多，以我來說，今年八十二歲，抗戰開始那年我差不多十五、六歲，就開始離家一個人到外面生活，為什麼我對當時政府發津貼給流亡學生的『貸金』印象如此深刻，因為沒有『貸金』我們根本不可能進學校升學！我的家庭在當時還算是富裕的，在十五歲以前還享受到一些家庭生活；十五歲以後，幾乎就是自己一個人在外面，這與目前台灣大多數青年的生活經驗是很不一樣的。所以我們這一群八十幾歲上下，從大陸過來的人，大多成家比較晚，我直到工作比較穩定了，三十四歲才成家。這和現在年輕人二十幾歲服完兵役，就工作、成家是不一樣，多半經歷過一長段苦難的歲月。」

隨後，謝先生笑著說：「你說哪一樣經歷比較好？很難說，因為碰上那個時代，這不是我們個人能選擇的。現代年輕一輩講究生涯規劃，我們那一代，講通俗一點，就是努力讓自己活下去，根本談不上規劃，只是順勢盡力而已。」

經歷過戰亂、流亡的生活，曾經身處在動盪不安的時代，謝先生的語氣不帶絲毫怨憎或自憐，只有為自己人生奮鬥的務實與努力。

參、世界上雖沒有完人，但仍有值得尊敬的人

在謝先生的心目中，有許多位人物讓他覺得敬佩，足以為表率，但他一再強調，即使如此，這些值得尊敬的人物，仍然沒有一個是完人，因為天底下原本就沒有完人，再傑出的人，也都會有缺點；同樣的，即使是極具爭議的人物，也有可能做出令人敬佩的事：

「從人的觀點來看，天下沒有完人。若只從完人的角度去看一個人，那麼優點還沒看出來，就已經先看出他的一大堆缺點。換句話說，人都有許多的缺點，但是有缺點的人並不代表他不會做出一件好事或幾件好事。所以我認為，談談有哪些好事比較具體。陳立夫先生是一個有爭議的人，三十剛出頭就當教育部長，他在國民黨、在政府當中負了很多很多的責任，我本身對他也有很多批評，這個我們不談，我想談關於他的一件事情。你們可能不知道，我是正好抗戰開始的那一年念高一，當時抗戰才開始不久，我們大片的土地都丟了。換句話說全國到處是流亡學生，流亡學生就是年輕人離開了家，跟著政府不斷的向後方移動，也沒有學校進。那時候正好陳立夫先生當教育部長，他在中央推動了一個『貸金制度』，就是說如果你家的所在地區淪陷了，而你考進了學校之後，政府就給你貸金。每個月到學校的主計單位去蓋章簽字，就可以領一份伙食，儘管伙食不是很好，但至少不會餓肚子。現

在去問問年紀約八十上下從大陸過來的人，很少沒有享受過這個貸金。也正因為有這個貸金制度，使得原本許多沒有辦法繼續學業的學生，變成國家有用之才，因為經過學校的學習之後，畢業後他就具有工作的能力，而這些都是國家的資產。如果沒有這個制度，可能就有成千上萬的青年人沒辦法上中學或大學。所以當年的『貸金制度』，不僅是造福了許多青年，讓我們國家的青年學子有接受教育的機會。當時一所大學裡，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學生都是依靠貸金。當時規定是要還的，但事後大部分的人都沒還，我們都欠了政府一筆債，另一方面也是政府不曉得到哪兒去要這些錢。」

謝先生接著談到其他幾位值得效法與尊敬的前輩們：

「梅貽琦先生，他擔任清華大學校長，前後有幾十年，從抗戰前，到抗戰，到勝利復原，政府播遷到臺灣，清華在新竹復校。後來出任教育部長兼中國童子軍總會理事長，我有幸追隨。他是位典型的『彬彬君子』。講話輕聲細語，要言不繁，平易近人，他告訴我說：『擔任行政工作太久，專業學識早已落伍，祇能欣賞年輕人，知才善任。』我體認出一個偉大教育家的風範，這才是平凡的偉人。此後歷任教育首長都有他們自己成功的地方，也都有其缺點，畢竟沒有人是完人。像陳雪屏先生、劉真先生、潘振球先生、朱匯森先生，這幾位是教育界當中，讓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幾位，倒不是因為他們比我年長，主要是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工作上，都表現出令人敬佩的風範，可以做為後來的教育工作者學習模仿的對象。」

肆、投入童軍活動的因緣

.....

謝又華先生參與童軍的時間極長，從年少時只覺得新鮮有趣，到後來成為童軍界推展許多活動的重要人物，地位尊崇。談起小時候加入童軍時有趣的回憶，謝先生笑著說：

「我投入童軍活動將近七十年，民國二十三、四年新生活運動發起的時候，我已經是童子軍了。其實那個時候沒有所謂幼童軍，而我唸的是教會學校，教會學校因為學費收得較高，通常都是比較有錢子弟唸的，教會學校的制服也比較漂亮。因此雖然我實際上還只是小學生，但我已經是童子軍，印象中童子軍是另一種制服，和學校制服不同，但也是很漂亮。記得老總統在江西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時，我正在江西南昌唸六年級，那個時候沒要讓一些警察、憲兵站在台上，而找一些童子軍站在台上，我當時就是被找去站在台上。說是保護老總統，但一個小孩子能保護什麼呢？但對我卻是個很有趣的經驗。還有當時參加童軍的時候只是小孩子，對童軍

活動的內容與精神其實並不瞭解，只知道『準備』、『日行一善』的銘言，那是我對童軍最深的印象。其他的就是童軍活動很好玩，可以去野外活動、可以和小朋友一起做很多的事情，日行一善，每天躬身實踐。到民家去教平民識字班等等，就覺得滿有意思的，甚至畢生難忘。到抗戰發生，我唸高中、大學就和童子軍沒有接觸。」

民國三十八年來台之後，原本於救國團任職的謝先生，在因緣際會之下又重新投入了童軍活動，此時的謝先生是將童軍活動推廣至校園及社會的重要人物：

「我是民國三十八年到台灣來的，雖然我原來是童子軍，但已離開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民國四十一年，救國團成立，那個時候國民黨中央又通過一個決議，要將所有青年組織通通都交由救國團統一領導，這個決定在當時政治環境來看也許是不錯的。不過對童子軍就有礙難之處。因為童子軍是一個國際性的組織，它有世界總部，有亞太區的總部，國內還要歸另一個組織，這樣就不太對啦！有人向中央反映這樣不對。當時擔任駐會常務理事的政大教育研究所所長吳兆棠先生就代表童子軍總會去和救國團接洽，於是經國先生就把吳兆棠請到救國團做副主任，還要從救國團中找一個人去幫忙，因此就找了我。為什麼會找到我？因為救國團的高階主管當中，只有我比較年輕，同時我做過童子軍。而我到了童軍總會之後，沒有擔任總幹事，免得擠走總幹事，所以我堅持做副總幹事就好，這樣就不會讓原來的總幹事失去工作。」

重新進入童軍活動，憑藉著多年救國團服務經驗的累積，讓謝先生在新工作的推展上，很快便受到各界的認同與稱許：

「其實我最不會帶大家做活動，到現在還沒辦法帶大家做個遊戲、唱個歌。我想大家說我帶領童軍活動的能力很強，主要關鍵是因為那時救國團本身活力很強，救國團的人並不多，救國團工作的第一個對象就是學校。由於我們和校長有很多接觸，所以我們就有較多的機會把童子軍介紹給他們。在我任職期中，很多校長來參加童子軍的活動乃至於訓練，所以這樣就讓童軍的力量增加了。」

一、童軍活動的萌芽與發展

基於謝先生與童軍之間如此深厚的淵源，因此對於童軍活動出現在中國及其後續的演變，謝先生如數家珍地道來：

「民國元年嚴家麟先生在武昌中華學校創立童軍團，武昌又是中國革命起義聖地，到抗戰時期在重慶正式確認嚴先生為中國童子軍的創始人。其實童子軍並不只是由嚴先生一個人在武漢發起。因為童軍這種社會活動在通商口岸都易冒起，就如同鳥飛過灑下的種子容易到處生根發芽，所以當時在武漢、上海、廣東等地都有。在民國十六年北伐完成後，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到民國十九年才正式成立了全國性組織。」

民國三十八年政府播遷來台之後，台灣地區的童軍活動也在政府的推廣之下逐漸開展：

「抗戰勝利之後，張忠仁先生被派至台灣從事教育工作，擔任臺南師範學校校長。由於張先生早在民國十三、四年時就參加了童子軍，因此隨著張先生到台灣工作也就把童軍帶到台灣了。但是由於張先生在臺南師範當校長，因此主要的影響力在南部，對於全面的影響還是很少。加上那時政局不安定，其中還發生了二二八事件、政府從大陸撤退來台等等，因此童軍在當時談不上很大的發展。真正開始在台灣推動童軍活動，應該是在陳雪屏先生擔任教育廳長時期，蕭忠國先生受聘作童軍的省總幹事，成立省理事會開始，蕭先生當時在師範大學做訓導長。而當時的教育廳長就是當然的省理事長，教育部長就是當然的總會理事長，換句話說，一切都還沒有法制化。童軍在民國元年就已經引進中國，而台灣在日據時代也有童子軍，但那很少，屬於特權性質，少數的小孩、少數的學校可以參加，而且是日本童子軍。直到民國三十七、八年，從陳雪屏先生當教育廳長開始，中國童子軍台灣省理事會才算成立了。」

回顧從民國元年乃至於到台灣之後的早期童軍發展史，謝先生特別澄清在過去時代背景及環境因素影響下，由於對童軍活動瞭解的不夠清楚而產生的不正確觀念：

「從民國元年到三十八年，整整三十八年的時間，很少人真正瞭解什麼是童子軍，即使當權者也不瞭解。當然我們也不能怪當時的人不努力，或是學問不夠，只能說都是因為戰亂，所以大家沒有餘暇發展。大家看待童子軍，覺得這個活動很受歡迎，因此在民國十三年，國民黨以黨領政，以黨領軍的時代，就成立中國國民黨童子軍司令部，因為有個『軍』字就想到用司令部。張忠仁先生是第一任司令，第二任才是何應欽先生。就這樣一直到民國十七、八年，廣州政府已經慢慢統一全國，到了南京。因為當時覺得稱為中國國民黨童子軍司令部，好像把小孩都編到軍隊裡面去，不太妥當，因此就成立童子軍總會，推請老總統作會長。但老總統的觀念當中，還是把童子軍當成預備軍訓。所以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就特別提到成年的國民應受軍事訓練，未成年的國民應該受童子軍訓練。嚴格來說，這是對童子軍的誤解。未成年要受童子軍訓練這句話是大有問題的，因為童子軍活動當中最重要原則是要自願參加，通通都要受訓就不叫自願參加了，所以未成年國民應接受童子軍訓練，是因為誤解了什麼是童子軍運動。」

謝先生緊接著說明童軍活動的真正精神，及參與這項活動人員應有的正確認知：

「事實上，對於童子軍來講，青少年一定要自願參加，自願參加才會有榮譽感。因此他要自行履行童子軍的規律、銘言、誓詞。如果是被動要這樣做，大家都

要這要做，就沒有這個榮譽感了；對於在童子軍運動中的成年人一定要是義務服務，不能夠受酬。而少數受薪的專業人員是為義務人員而服務，受薪的專業人員人數極少，他們服務的對象是義務服務員，他們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總會或理事會辦一些必要的業務，一定要把這之間關係弄清楚。童子軍運動是個人主義的產物，也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是從西方文化衍生而來的，是承認有神的。和共產主義的集體主義和無神論是不同的。所以共產國家幾乎沒有一個有童子軍。」

二、難忘的國外童軍交流經驗

多年來，謝先生參與過無數次國內外的童軍活動，累積了豐富的經驗，在國際童軍界享有盛名，並於民國五十九年至六十三年擔任了世界童軍委員會亞太區副主席。在多次遠赴國外參與活動的經驗中，謝先生談到了令他印象深刻的外蒙古之行：

「當時外蒙古剛脫離蘇聯的控制有意展開童子軍活動，世界童子軍總部要求亞太地區各會員國，贊助舉辦外蒙古第一屆服務員訓練，派遣訓練人員前往烏蘭巴托。我體認到外蒙古同我國歷史淵源，又深知日本人對外蒙古野心和積極介入，所以建議總會我們應該不要放棄這個機會，向總部承諾我們願意組織訓練組來承擔這個任務，為外蒙童子軍做播種工作。本來我不擅長訓練，在國內我也沒有辦訓練的經驗，可是亞太總部也許覺得我曾經擔任過亞太區副主席，在國際上較具知名度，就指派我擔任訓練主持人。一共有十二、三個人到外蒙烏蘭巴托辦訓練的人員，包含香港、菲律賓、巴基斯坦等地的人員，但除了一個巴基斯坦人之外，其餘通通是中國人。那一次的外蒙古之行，雖然他們是以國際友人的身份特別招待我，但是在那裡的日子還是很艱苦，我們一般人到了那裡實在沒辦法過，但卻是很有趣的經驗。我們為他們訓練了第一批一百多位義務服務員，灑下了義務服務員的種子，特別是前一陣子外蒙古還邀請我們和其他國家的童子軍參加了他們的全國童軍大露營。」

瞭解童軍活動真正的精神之後，國內童軍界的相關人員於是開始到國外接受訓練，謝先生談起這段受訓的經驗，及在國外所得到的啟示：

「吳兆棠、陳忠信、劉元孝先生到英國童子軍參加了 1957 年五十年世界大露營，大露營之後特別為各國的童軍領袖辦了一個木章訓練。當時吳兆棠他們全都去受訓了，進一步瞭解義務服務員訓練狀況。而我就帶著另一個隊伍到美國，由於美軍顧問團在台灣有一個眷屬童軍組織，和我們聯繫的很密切。當時他們正在舉辦一個『空中交換訪問』他們有飛機在日本、韓國、台灣之間往返，美國方面則派了三隊童子軍參與交換訪問。我帶了六個人的交換訪問隊到美國去，後來我留在美國考察美國童軍組織，也參加專業服務員訓練學校，前後半年，也因為這樣才弄清楚整

個童軍活動是怎麼一回事。所以我剛才強調童軍的兩個觀念『志願參加』、『義務服務』是磨了這麼多年才磨出來的。而『義務』的觀念，以當時我們社會的發展而言，還不太容易被社會接受。平時每個人都是辛辛苦苦的努力工作，週末還有家庭的責任。現在我們社會較為富裕，許多社會團體乃至政府都有義務服務的人員，這表示我們的社會已經逐漸進步，所以很多社會學者把義務服務的人數多寡，當作社會進步的指標，這是很有道理。」

在美國接受了充分的訓練，也深刻瞭解到童軍活動中「志願參加」與「義務服務」兩項最重要的原則之後，謝先生不斷嘗試將這兩種觀念帶到社會上，並且引導社會各界瞭解童軍活動真正的性質與精神：

「當年要介紹這個觀念不容易，我想了很久，發現祇有一種組織勉勉強強可以算是義務服務，就是義勇消防隊，但仍然不完全一樣。那麼難道我們中國傳統都是不幫助別人，沒有服務精神嗎？當然不是。我們傳統所謂義務服務完全是個別的，例如修橋、鋪路、施藥，自己有錢就做，不需要動員別人，也不需要組織力量。這種在農業社會是可以的，進入到現代社會，一切都要有組織的，才有力量。那年我到美國去，訪問了很多地方，其中特別訪問了一個組織叫做『志願服務協會』，現在台灣也有了。當時美國人口剛剛到兩億，而他們的會員就已經有六千多萬。我簡直不敢相信。但是現在如果我們把所有宗教、農會、工會、各級政府、教育和社會團體所有義工都加起來，也可能有兩三百萬了。童子軍運動創立之初，基本上並不是打算嘉惠每個青少年，而是嘉惠於願意成為童子軍的青少年，而我們一開始就弄錯了。以為既然這個活動這麼好，就讓每個青少年都做童子軍好了，當時的邏輯是這麼簡單。現在說它錯，好像有點殘忍，但我們還是必須承認當時的方法是錯的，因為那樣並不能真正發揮童子軍運動的功能。」

長期以來參與童軍的活動，就謝先生而言，對他的人生有著極大的影響：

「我參與童子軍以後，自己感覺到對我本人有很大的幫助。這又呼應到我的座右銘『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因為當時做的時候也就是接受任務的心態去做，而努力做的過程，自己無形中就會獲得很多進益，也開拓了眼界。」

三、推動童軍獎章制度的緣由

國內童軍獎章分為青松、翠竹、臘梅三種，對於當時推動童軍獎章的緣由，謝先生說：

「貝登堡在設計童軍活動時，有一項徽章制度。所謂徽章制度聽起來似乎太嚴肅了，其實就是用設計得比較漂亮的徽章來表示不同的成就。例如：對其他技能或

社會服務的成就分別用不同的徽章來表示，能在野外露營兩天，表示你已經有這個經驗可以獲得了一個露營徽章，成年服務員同樣喜歡、需要。所以有時候我們會看到有些服務員掛了多種不同的徽章。至於松、竹、梅三種勞績徽章，如果我記憶沒錯的話，是專為義務服務員，特別是團長設計的。因為童軍運動裡，團長直接領導童子軍最為重要，所有成年人都是義務來服務。只是工作上有區分，地位上沒有高低。原來我參加總會工作的時候，只有童子軍，後來我發展為行義童子軍、羅浮童子軍、幼童軍。原來的徽章也只有幾種，後來才發展成為多種，這些多半是國外參觀、交流，受到影響而發展出來的。徽章一定要依照制度來頒發才有徽章的價值，如果不做團長而掛團長的徽章，就沒有意義了。也就是因為團長對實際的童軍活動付出最多，投入的時間也最多，不同於一般理事或會員祇是開開會而已；再來是因為看到國外有這種突出團長的制度，覺得人家這樣做很有道理，所以就開始推動。其實這種就是童軍徽章制度的實踐，用之於青少年和用之於成年人一樣有效。」

四、童軍活動與教育之間的關係

童軍在國民中學曾經被列為課程的一部分，謝先生並不完全贊同，對於這個問題，他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

「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把童子軍教育列入初中的課程，九年國教時也一樣，對於這件事我一直認為不妥，因為童軍與學校教育雖然可以相輔相成，但畢竟是不同的兩件事，而師範大學還專門設童子軍專修科培養為專業師資。如果突然說要改，培養了這些老師結果學校不聘，那培養教師做什麼呢！要改變這個很難。於是我出了一個主意，讓童子軍運動歸運動，而學校童子軍課程由教育單位去管理，不是我們童軍總會的工作。童軍總會可以做為教育單位的顧問，提供必要建議，但是該如何聘老師、如何上這個課是教育行政和學校的事。當時教育部和童子軍總會都接受我這個說法，因此，我負責的那一段時間都盡可能把這兩樣東西隔開。教育部還特別頒訂一個初級中學童子軍教育實施辦法。我把初級中學童子軍教育就做高中的軍訓。一方面跟老總統所寫的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當中，所說的未成年國民受童子軍教育的原則不抵觸；另一方面童子軍運動可以解脫許多束縛，積極向社會和各級學校發展。同時童軍運動也靠著學校，才有發展的著力點。協助各種社會團體主辦童子軍團，吸收各行各業社會人士來參與作為服務員。」

在謝先生的心中，童軍運動終究不等同於學校教育，把它化為課程更不適當，因此童軍之於學校教育應該是輔助的性質，是教育性的社會事業，而不應完全屬於教育事業：

「童子軍的活動與學校教育之間，由於對象的年齡層相同，因此看起來似乎是有些重疊。一個健康的社會，一定有很多教育性的活動，來提昇社會的朝氣和活力，例如：體育活動、藝術活動、文化活動、宗教活動等等都是。而這些活動也大多是有教育價值。童軍運動就是以青少年為對象的一項社會活動，是教育性的社會事業。可以發揮補助教育的功能，可以充實青少年的社會生活，促進群育的發展。」

強調童軍活動的意義與價值，但卻不將童軍活動視為無所不能的神話，學校教育與童軍活動各有其本來的目的，可以相輔相成，但不能混為一談。釐清這一層關係之後，謝先生進一步說明參與童軍運動對青少年在日常生活與人格陶冶方面所帶來的正面影響，並語重心長的點出現代社會缺乏服務精神所面臨的危機：

「童子軍提倡日行一善、人生以服務為目的，這不是口號。童子軍活動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要啟發青少年想到別人、幫助別人、為別人著想。那怕是小小的一件事，例如：清除一堆垃圾、搬開一塊石頭、到社區服務等等。讓青少年在服務中成長，透過服務訓練養成青年服務的人生觀。這種人生觀不祇靠老師教給學生的，一定要親身體認，他才瞭解其中的意義。童子軍活動就是將社會服務這個部分縮成青少年可以勝任的層次，讓他去幫助鄰居、幫助街坊。今天社會最大的危機是不想到別人，只想到自己，能夠想到別人，這個觀念對於青少年，對於社會都很重要。這應該是最核心的價值所在。」

五、童軍和救國團兩者間的關聯

由於謝先生在救國團與童軍兩個組織中，都有極豐富的經驗與資歷，而這兩個組織的主要對象也都是青年和青少年，但就謝先生而言，這兩者之間有若干差異：

「我認為救國團是一個階段性的組織。事實上，到現在救國團成立時的階段任務已經結束，雖然任務並沒有充分完成。因為當年成立救國團的理由，現在已經不存在了。社會也有了大的變化。救國團必須開新的窗，針對青年和國家新的需要，設計新的工作才有存在的價值。而童軍運動卻是永久性的組織，只會有時候發展得很好，有時候會發展的差一點，它會永遠存在且沒有階段性的問題。它經常在青少年教育功能中會發生一些作用。所以救國團和童子軍之間的差異應從這樣的觀點去看。」

伍、投入教育工作的機緣與體驗

.....

謙稱自己非教育科班出身卻進入了教育工作的領域，曾經擔任教師、教育廳長、教育部總務、社教司長的謝先生，談到教師、家長在孩子教育上所扮演的角色

及應有的態度：

「我不是學教育的，但是誤打誤撞認識了一些從事教育的朋友，到臺灣就走進教育這個領域。後來長時間在教育行政服務上，勉強可以算半個內行，不是真正內行。我總覺得對教育工作者來說，如果沒有興趣，只是爲了生活，那最好不要從事教育這一行。因爲這樣是誤人誤己，你在工作上得不到樂趣，又耽誤了受教育的學生。所以我一直強調想做英雄事業就不要做教育工作，缺乏對教育關懷的也不要做教育工作。這跟生性有關，不完全是後天培養的，也不完全是理性的要與不要。有的人就是喜歡年輕人，並對他們產生影響，有些幫助；而有的人是看到小孩就厭煩，我自己的小孩也曾遇到這樣的老師。做爲一個家長我常常講，如果你自己都不在意、疏忽小孩子，你如何要求老師特別在意你的小孩子？老師要照顧幾十個學生，你的孩子只是其中一個。所以我說你自己要在意，要從這個角度去思考。雖然我的小孩也曾遇到那種不適合擔任老師工作的老師，但經過我以家長身份多次的接觸之後，至少我的小孩還沒有受到嚴重的影響。」

陸、對所有教育工作者的勉勵與建議

謝先生認爲教育工作者並非英雄，而是成就整個偉大教育事業的一份子，因此想成爲英雄者，不適合擔任教師：

「我一直認爲我自己只是一個教育工作者，不是教育家，在我從事教育工作這麼長的時間裡，我發現教育本身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這個工作對國家社會的重要，比經濟建設、文化建設都更重要。但從事教育工作的人不是英雄，是平凡人。想做英雄的人首先我會勸他不要念師範，如果他念了師範，我會勸他換一個行業，因爲老師的工作滿足不了他的英雄慾望。各行各業都可以產生出類拔萃的人物，但教育的事業卻最需要善盡本分的人。所以我在教育廳的時候，特別對師專應屆畢業生說：『教育工作是一個平庸人所從事的偉大事業。』」。

謝先生朗聲笑著說：「如果了不起的人才，留在學校繼續做一個一般的教師，也很可惜。我覺得他最好往另外的路去發展，尤其是天生就有領袖才幹的人，天生就會經營事業的人，甚至於具備學術研究雄心的人，這些都不適合留在學校，特別是中小學裡面。」

謝先生接著收起了笑容，以嚴肅的口吻說道：「人總是平庸的比較多能安於本位，平凡的人較爲適合從事教育工作，傳道授業解惑是一個教育工作者神聖的責任，所以平庸也可以不朽。」

對於所有從事教育工作者而言，「專業精神」是一種必備的素養，而「教育愛」則是基本的信念。針對教育的「專業精神」和「教育愛」，謝先生有其獨到的詮釋：

「教育工作不能斤斤計較，付出和收穫往往不相等，老師的苦口婆心，有時候可以影響一個學生一生，有時候也會盡付流水。做一個教育工作者不要對學生失望，懷著希望工作，會使你『樂在其中』。」

柒、對教育改革的想法

.....

謝先生曾經擔任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廳長，因此與學校教育工作有最直接的關係，也有最清楚的瞭解，對於今日諸多教育改革措施，謝先生有這樣的看法：

「另外對於教育改革方面的問題，我個人研究不深，所以不敢多做評論。只是我有一點想法，我認為教育是需要不斷的求變，不能求急功，要求急功的改變，往往是功未見，弊已先現。該是一點一點的變，慢慢累積，最後形成整個教育的轉型。這不能只憑理想，更不能照抄外國的作法，不只要是在教育體系內的配套，還得和社會文化、經濟發展配套，不論如何創新，都不能脫離傳統文化。所以如果有那一位部長想在任內就要教育換一個面目，成就豐功偉業，我不認為辦得到。對於那些具有學術光環的朋友們，我特別願意提醒，在專業學術的範圍內，也許你是位權威，可是在教育改革的工作中，你祇能是一個提供意見的人，不要作一個指揮者，你也許是一位智者，可是別忘了許許多多受教育的人，卻是平平凡凡的人，我們的教育，必須為這些人著想。」

捌、童軍精神的發揚

.....

鑑於童軍活動對青少年及社會的助益，謝又華先生仔細探究童軍活動的真正精神，積極參與國內外童軍活動，並建立童軍獎章制度，使童軍活動在這塊土地上有更多熱心的成年人來參與，必能為更多的青少年服務，造福社會。

參考資料

教科書中如有錯誤教師不能將錯就錯：教育廳長謝又華昨表示鼓勵教師協助校正課本（民 67 年 11 月 2 日）。聯合報，第 2 版。

謝又華（民 73）。良師興國。載於張植珊等（主編），台灣省教師精神修養專輯第十一輯—師道尊嚴（59-69 頁）。台中縣：台灣省政府教育廳。